

中国古代的“统战”智慧

□ 鮑家树

中国自古便有“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等观点，而且，在政治运行中，为了实现统一、维护统治，不乏团结联合政治、社会、民族、宗教力量的统战实践。

盟津之誓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结盟、会盟不胜枚举，例如吴蜀联盟、宋金联盟等，而“盟津之誓”则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引致朝代更迭的结盟。

商朝末年，纣王残暴无道，激起民众不满。公元前1048年，周武王姬发率军在盟津誓师，决意伐纣。各地诸侯和部落首领800人闻讯前来，一致认为“纣可伐矣”。周武王因行军至盟津途中，见“白鱼跃入王舟中”“有火自上复于下”，认为灭商时机未到，因此还师暂缓。两年后，周武王再度率兵，遍告诸侯“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并与各路诸侯再次在盟津会师，周武王作《太誓》，怒斥纣王暴行，号召诸侯“共行天罚”，讨伐商纣。

两次盟津集会结盟，发出了兴周灭商的动员令，确立了周武王的盟主地位。牧野之战，商军溃败，周武王率领的联军大获全胜，创立周朝。

合纵连横

战国时期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大争之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一统局面不断实亡。七雄并立，征伐云起，战国后期，“合纵连横”的施政策略在各国盛行，合纵是指“合众弱以攻一强”，即齐、楚、燕、赵、韩、魏等国联手对抗秦国；连横是指

“事一强以攻众弱”，即依附秦国进攻其他弱国。公孙衍、苏秦、张仪等都是当时著名纵横家。

历史上，合纵攻秦的战争共有5次。公元前318年，秦惠文王时期，公孙衍发动魏、赵、韩、燕、楚等国合纵攻秦，但出战时，燕国和楚国按兵不动，驻军观望。联军为秦所败。公元前298年，秦昭襄王时期，孟尝君发动齐、韩、魏等国合纵攻秦。联军攻入函谷关，秦国战败求和。公元前287年，秦昭襄王时期，苏秦发动齐、赵、魏、韩、燕等国合纵攻秦。联军抵至函谷关外，秦昭襄王主动宣布取消帝号，归还魏国、赵国的城池。联军未与秦军交战而撤退。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时期，信陵君发动魏、赵、韩、楚、燕等国组成联军大胜秦军。联军攻至函谷关，秦国坚守不出，联军撤退。公元前241年，秦王嬴政时期，庞煖发动赵、魏、韩、燕、楚等国合纵攻秦，遭遇秦军主力，联军以失败告终。

因各国实力不一、利害不同，合纵联盟并不是铁板一块。联盟是短暂而松散的，各国相互攻伐，其间甚至也穿插着各国迫于形势的连横，甚至秦王嬴政横扫六合，建立秦朝，形成天下一统的格局。

和亲

和亲是中央政权统治者与少数民族首领以及少数民族首领之间具有一定政治目的的联姻。这种施政策略是通过联姻的方式将政治关系亲情化，进而缓和或促升政权之间的关系。

和亲始于汉高祖以宗室女嫁匈奴单于，后有隋唐时期中原王朝与突厥、吐蕃、回鹘、吐谷浑等和亲，宋代契丹与党项李继迁和亲等。其中，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等被传为佳

话。汉元帝时，王昭君以良家子选入掖庭为宫人。当时，汉与匈奴经过百余年战争，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正月，呼韩邪单于朝见汉元帝，愿为汉氏之婿，于是汉元帝将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以结和亲。文成公主是唐宗室女，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嫁于吐蕃松赞干布。入蕃时，松赞率兵亲迎，唐室带去了书籍、经像、种子、工具以及工匠等等。文成公主在吐蕃40年，对增进唐与吐蕃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大有贡献。

和亲对缓和民族矛盾、巩固中央政权统治起到一定作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体现了和合共处的政治理念。

羁縻

“羁縻”是中央政权对境内及其周边少数民族区域实行的管理方式。古人将马络头称为羁，将牛鞅称为縻，因此用羁縻表达系联、笼络、管理之意。

《史记》记载，早在夏朝时期，中央政权已经对少数民族实行“因其故俗而治之”的政策。唐朝设立羁縻府州，使少数民族既臣属于中央政权，同时又享有较大的自治权。元朝在各民族聚居区实行世袭其职、世守其土的土官之法，利用当地民族首领治理当地事务。明代正式演变成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

羁縻是以少数民族接受中央政权统治为前提，其具体内容是因俗而治、因地制宜，充分体现了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认可与尊重，正确处理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既加强了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又有利于多

可能会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实际上，这一问题已经不同程度出现了，比如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工资拖欠、加班过度、保障不足等。这显然不利于提高劳动大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因此，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诸多措施，以扭转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劳动力市场过度灵活的局面，更好地实现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稳定性的平衡，比如2007年通过了《劳动合同法》等“三法一条例”，2015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若干意见》等。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切实提高劳动者素质

劳动者素质是决定就业状况的重要因素，素质高者有更强的就业能力和就业岗位创造能力，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需要有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实际上，我国在不同时期都将教育和培训列为重要议事日程，使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既促进了就业，又支撑了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发展正规学校教育，举办“转业训练”“扫盲班”“夜校”等多种形式，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快速提高。改革开放后，教育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化。40多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大踏步前进，截至2018年，九年义务教育已经高质量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将近9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近50%。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18年就业人员与1982年相比，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员占比由0.9%上升到20.1%，高中受教育程度人员占比由10.5%提高到18.0%，初中受教育程度人员占比由26.0%提高到43.2%，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人员占比由62.6%下降到18.7%。

除各级各类正规学校教育之外，为更好地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国家还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事业，将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作为预防失业、稳定就业和促进再就业的重要举措。比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要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

民族国家的安定、繁荣和统一。

互市

互市是中央政权开展对外贸易或同边境民族间的贸易。

汉初，中央政权便开始同南越和匈奴通商。魏晋以后，又称“交市”，西北陆路贸易更加繁荣。隋代在西北边境设交市监，唐贞观六年（632年）改称互市监，沿边设互市场，以马市为主。宋、辽、金、元在边境设榷场互市。宋咸平五年（1002年），在灵、夏二州番族屯聚的赤沙川、橐驼口，分别开设定期的市场。景德四年（1007年），宋朝正式设置保安军榷场，与党项开展贸易。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和议后，开设保安军顺宁寨、镇戎军高平寨两个榷场，与西夏进行互市交易，宋主要输出丝绸、瓷器、漆器、茶叶等货物，西夏主要输入牲畜及畜产品、药材等货物。宋还以茶、盐等同边疆各族换马，北宋初设置市马务，掌管向西北少数民族买马事宜。清代与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贸易，由理藩院和当地将军、大臣及各旗札萨克管理稽查。内地商人领有理藩院票或当地该管衙门的执照，即可前往贸易。张家口、伊犁等处均为重要的互市点。

互市的盛衰与政治、军事斗争密切相关，对维护中央政权的安全与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治边政策。同时，各民族之间通过互市开展经济交往，促进了物资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了解。



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职业教育和培训不仅提升了劳动者专业技能，也增强了劳动者的职业精神和工匠精神。

坚持底线思维，对就业困难人群给予特殊关注

任何社会、任何时候，总有一些人群由于各种原因，就业比较困难。如何帮助他们更好地就业，坚守就业底线，是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

回顾过去70年，在不同阶段，就业困难人群所指可能并不一样。在改革开放初期，返城知青属于就业困难人员，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成为了就业困难人员。再后来，“4050”人员（40岁以上女性、50岁以上男性）、失地农民、零就业家庭中的劳动年龄人员、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的长期失业人员、化解过剩产能的企业职工等，都曾是程度不等的就业困难人群。对于这些群体，我们坚持底线思维和社会政策要托底的基本要求，有针对性地制定了相关政策和措施，使他们比较好地实现就业或再就业，始终保持了较高的就业水平。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残疾人就业与创业，不仅从法律层面保障残疾人就业权利的实现，在公共政策方面也推出了各种支持和促进残疾人就业与创业的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残疾人就业经历了福利企业的发展，按比例就业的逐步推进，辅助性就业、公益性岗位就业的兴起，个体就业、灵活就业的蓬勃发展和支持性就业的积极探索，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残疾人就业形式，极大地促进了残疾人就业，帮助残疾人脱贫增收。截至2018年，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达到了948万人。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就业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不过解决就业问题的智慧已经存在于积累起来的经验之中。总之，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就业之路成就令人鼓舞，经验弥足珍贵。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

吴起（约前440年—前381年），战国时卫国人，以能征善战、治军有方闻名于世，乃至孙吴并称。据《史记》《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文献记载，在当时波谲云诡的战国初期，其不择手段式的谋求事功行为，也多为后人诟病，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在政治、军事方面所展现出的天赋和智慧。从所立功业反推，其学识融通了儒、兵、法三家精髓，典型主张和具体做法也在《吴子》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由良善政治向强劲军事的延伸

《吴子》首篇“图国”，记录了吴起首次见魏文侯时二人的对话情况，言“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以儒士形象见国君，却却当时求贤若渴的“士”受作为显学的儒家影响较深外，主要还是体现了儒家在吴起身上留下的深刻印记，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称霸首要前提还是在强国这一基本现实需求。

众所周知，吴起出仕之前为曾参之子的弟子，因坚守其当初“不为卿相，决不回卫”的誓言而不奔母丧，被以孝著称的曾申逐出师门；但从其后为魏河西郡守时，师从大儒卜子夏来看，其儒家治世思维和追求的底色是没有变的。从其言来看，“图国”中高举“内修文德”的旗帜，也是对儒家仁德思想的积极回应和进一步阐释，但需要指出的是其兵家角度阐释文德与武备二者关系。如言“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提出爱民和众而后能战的鲜明观点，进而对照“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和于军、不和于陈、不和于战），作为是否能出军进战的重要指标，认为“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又以“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时天”作为举事前的必要环节，以向民众宣示“爱其命，惜其死”的慎重与庄严。从功利来看这一系列动作有表演成分，但不失为和众为一的良善举措。他又进一步提出“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则是典型的儒家治平天下的主张，与孔子“教民以战”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明确了以道、义、礼、仁“四德”为“举顺天人”的支点，更是抚民以强兵之道。从其在守河西、抗强秦的表现来看，整军经武、爱兵如子的事迹，也多少能够反映出其爱民和众、使民有方的显著特点来。

从知己知彼到百战不殆的落地

魏武侯继位，颇有凭借文侯打下的牢固基础自鸣得意之势，在巡西河而下时，向吴起夸口道：“美哉乎山河之固，此为国之宝也！”吴起明确提出“在德不在险”的命题，引经据典指出上古三苗氏为大禹所灭、夏桀被商汤“革命”、殷纣由武王杀之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德义、仁政不修，而非山河不够险固，听闻此言，魏武侯也不得不称善。

据《吴子》记载，在与武侯分析魏国所面临“四战之地”不利形势的对话中，吴起充分肯定了其忧患意识，指出这是武备强劲的前提。并深刻分析了“六国之俗”，精准地点出了“齐陈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陈治而不用”的优劣。进一步从各国施政特点切入，细致探究了“六国”之强必有其弱的实际，可谓尽知敌情，真正把握了知己知彼的制胜关键。

他进一步提出“教戒为先”的针对性策略，以谋求先胜之势，首先是着力锤炼精兵强将，指出“一军之中，必有虎背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成马，拳旗斩将，必有能者”，要对这些孔武有力、能征善战者予以精细拣选、重点任用，作为整个军队的命脉所在予以悉心养护，足可以坚阵持久、以寡敌众。按照这一原则，吴起训练出了一支能征善战、忠义可靠的“武卒”群体，在整个战国时期，发挥着安国全



军中流砥柱的作用。对于带兵作战的将领的选任，吴起制定了更为详细甚至严苛的标准，明确“总文武者，军之将也”的高起点，提出“理（治众如治寡）、备（出门如见敌）、果（临敌不怀生）、戒（虽克如始战）、约（法令省而不烦）”五项指标，作为理想将领的参照。另外，还从激励士气的角度，强调无论治军还是进战，都要贯彻严刑明赏的基本原则，鼓舞将士以杀敌立功为荣。

打开整军经武到领兵作战的通路

吴起戎马一生，为魏国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钜解”，为楚悼王相更是“南平百越；北平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可谓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究其原因，首要在于能治百官、亲和万民、充实府库；其次，在于治兵有方，其所领部队训练有素、梯次分明，有礼有威；再者，进展退守能够挥洒自如。

整军经武方面，非常务实地主张“四轻、二重、一信”，即“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其中“轻”分别对应的是熟悉掌握战场地形险易、适时适量饲养战马、注重战车日常维护、兵甲锋利坚固等，是对作战关键要素的具体展开；又有“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及“行之以信”作为保养战斗力、提振士气的重要保障。再者，重视对军威的培树，其言“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兵将能够做到听从指挥、令行禁止，达到驾驭节制、指挥若定的效果。

在与魏武侯对话中，就如同处置遭遇战、敌众我寡、脱身退守、攻城拔寨，以及在不同天候地形条件下谋胜等具体情况，提出了一整套应对之策，可谓字字珠玑，每每能够准确把握制敌取胜的要害。如在扭转敌众我寡的被动局面时，点出“避之于易，邀之于阨”原则，即避免在平坦地形与敌交战，而要想方设法借助险隘，发挥以一击十的效果。又如，面对敌人坚固持久的防守时，应根据情况分兵以迷惑敌人，随后发动政治攻势诱敌出兵或者打乱其节奏，以一路佯败吸引敌军出阵，再一路牵制敌之前，以另一路断其后路，再以两军秘密出动夹攻敌军据守的地方，最后五军合击，必能击败强敌。

